

韩咏华与梅贻琦的西南联大生活 (节选)

徐泓

与西南联大问世几乎同一时间,1938年夏天,韩咏华带着五个孩子,作别南柳巷韩宅,和清华几家教授结伴一路南下。他们走的是海路,先经天津、上海到香港地区,再乘船到越南海防,又经嘉林乘车过河,再由开远到达昆明。历时两个多月,他们终于找到了梅贻琦,历经一年多的战乱分离后,阖家在大西南的昆明团聚。

梅祖芬回忆:“当时我们一家、历史系雷海宗教授的太太和一个小女孩——那个女孩比我年纪还小点,还有一位刘太太带着一个小孩,由清华一位管总务的毕正宣老师领着坐火车先到天津。之后我们买了船票,从天津到上海,从上海到香港。我记得那船叫海口船,是一种很长的大船。为了安全,慎重起见,船开得特别慢,本来八天的行程,十六天才到。到香港后我们继续坐船到越南,那时候叫安南。后来又走了好长时间,下船后再坐火车。不记得是怎么才到了昆明,反正时间挺长的,也挺艰苦的。”他们刚到昆明的时候住在大观楼附近。梅祖芬说“就是那副副特长对联的大观楼”。她记得刚到的时候,看见父亲书桌上有一张他用毛笔写的字条:“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这是她有生以来记住的第一句宋词。

梅家来昆明后,先住在东寺街花椒巷6号,后常住西仓坡5号,这是清华大学昆明办事处。据梅祖芬回忆,西仓坡原来有东西两个院子,在一次轰炸中东院被炸出了一个坑。他们家住的西院,呈三合院的格局,三面有房,且均为上下两层楼。按照韩咏华的描述:“正面小楼上是月涵的书房和卧室。楼下即是联大办公处。我住在西面小楼上,楼下是会客室。教务长潘光旦先生住在南面的楼上。”

梅祖芬清楚记得楼下大厅是清华的办事处,她说:“学校开会就在大厅里。”她对清华秘书长潘光旦教授也住在这个院子里同样记忆清晰,因为她与潘光旦的女儿合住在办事处左边的一个房间。韩咏华对在西南联大这段生活描述得很详尽,后来许多写梅贻琦夫妇的文章,内容基本来源于此,可惜,或断章取义,或添油加醋,或借题发挥,甚至有的还无中生有,为尊重事实的原貌,我在此还是恢复韩咏华原本的文字吧:

我们的家先住在昆明花椒巷,一年后迁往西仓坡。……月涵一到昆明,就把校长专用的小汽车交给学校公用了。他外出开会、办事,近则步行,远则搭蒋校长或别人的车,无车可乘也从不埋怨。他经常和孩子们一起安步当车,走一段不近的路。在昆明的几年中,除了办校外,突出的事情就是跑警报,几乎天天要跑。日本飞机来轰炸时,从容飞来,从容飞走,可以说是畅行无阻,如入无人之境。一有警报,国民党空军自己先把飞机飞走,保护起来。昆明根本谈不上什么空防。西南联大也没有防空设施,飞机一来大家就跑开躲起来。月涵在走开之前,总是先把文件收拾妥当,放好锁好才走。他作为校长,也和教师、学生们一起跑到学校后面的小山上,在坟头之间躲避一下。日本飞机轰炸,至今还给我们的记忆留下一件很难过的事。每次跑警报,办事处都是把学校的文件放在一个简易的防空洞内,留下两个工友看守。一次,大家上午跑出去,下午回来时,发现办事处已经被炸,文件全被炸毁,两位工友也被炸死。他们之中一个是青年,另一个是老人,姓尹,以前每次大家跑警报回来时,他都预备些热茶给



梅贻琦与韩咏华

大家喝,可是这次却不幸被炸死了。1941年冬,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有些美国空军部队来到昆明,日本飞机不大敢来轰炸了,跑警报的事才少了一些。

另一位亲历者,清华的陈岱孙教授对跑警报也印象深刻:

一有警报,我们就往后山跑,上坟堆里去,飞机来了,就趴在坟堆里看着下炸弹,下了炸弹以后飞机飞走了,我们才站起来。那时候,张伯苓校长在重庆,蒋梦麟也经常到重庆去,有时也在昆明,但是很少参与学校里的事情。梅校长就是那个时候的校长,尽管名义上是常委。他经常每天办公,警报一来,也跟学生一样一起往后山跑,飞机来时,跟学生一样趴在学生身边。所以当时,学生看起来,梅校长是很亲近的。

在跑警报中,梅贻琦临危不惧、先人后己的君子风范给女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次在紧急警报后,来不及走避的同学,便集中在南院防空洞前,看见梅校长到来,当然请校长先行,而敌机已来空中机枪扫射,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校长仍坚持我们一个个先进去,自己殿后。长者风范,真令人钦仰。”

梅祖彦在自传体的《八十自述》里对初到昆明这段日子也有记述,主要讲了父母如何抓紧他的学业,但字里行间也写到了被“跑警报”严重打乱的日常秩序。

到昆明不久,就有日军飞机来轰炸,很多地方中学都疏散到乡下或外地去了。父母为我们请了家庭教师,在家学习,分初中、高中两个班。我和沈铭谦、朱文华在初中班,我们的主要教师是王般先生(他当时是西南联大助教,解放后为北京外交学院教授),他兼教中文、英文和史地等课,梅美德先生教几何。1939年全家迁到城北,这个私塾也就停办了。高中班的学生多数考入大学。

从这一年夏天到1940年夏天,我又在家自学了一年,由父亲教些数学、物理,到张彭春夫人家去学英文,自己学习历史、地理等。这一年的学习方式很不正规,但也适合当时需要常跑警报的环境。1940年秋考入昆明私立天南中学(英国公理会办),插班入高中二年级。此时家住城北,学校在城南,每天走路一个来回。后来空袭紧张,学校只在清早和傍晚上课,那就得每天跑两个来回,冯友兰先生的公子冯钟辽和我自幼是好友,现在又

是同学。我们每天在昆明的大街上不停地奔走,倒也把身体练出来了。

韩咏华在文章中还提到了搭蒋校长的车,这位“蒋校长”指的就是北大校长蒋梦麟。韩咏华说,西南联大三位常委原定每人轮流任两年主席,但张伯苓和蒋梦麟两位先生均在重庆另外任职,梅贻琦只好一人办理日常事务,遇到大事再找他们两位商议,因此更加忙碌。确实如此,尽管是三校联合,但清华在西南联大中占据主体地位。在西南联大成立之初,无论是学生人数还是教师人数,清华都占了半数之多。而在西南联大办学的八年多中,虽然名义上是三位校常务委员集体领导,但实际上,联大的日常校务和重大决策都是由梅贻琦主导的。

看来,蒋校长应该不常来昆明,他的车自然很难搭上。因此,梅贻琦在多篇日记中记下了他和子女安步当车的快乐。随手举一例:1941年5月11日,是个星期日,上午八点半,梅贻琦带次女梅祖彤、公子梅祖彦及幼女梅祖芬去梨园村,回程时“同步行返城内”。梨园村是清华大学教授和职员家属居住地,坐落在玉案山脚下,坐西朝东,村后大山横亘,全村南北延展约三四里。一条主街在村中蜿蜒,街道两旁散落着农家住户,树丛、池塘和打谷场点缀其间。据说过去村里梨树很多,有“梨园”之称。在云南话里“园”和“烟”相谐,因此通常在文字上把这个村子写成“梨烟村”,后来正式定名为“龙院村”。梅贻琦在日记中写道:“四点与三孩同步行返城内,六点到家。因途中缓缓行来尚不觉倦,三孩则较为高兴矣。”两年以后,他与孩子步行,仍然兴致甚高:“(1943年)2月9日午饭为徐行敏夫妇约新村,往返与彤、彦步行,颇有趣。”在校友蔡麟笔的悼念文章中也有生动如画的一笔:“梅先生……每天早晨由西仓坡清华办事处步行到新校舍,每天往返四次,四季蓝布长衫一袭,手杖一根,八年如一日。”

1941—1943年,是西南联大师生最为艰难的时期。据《西南联合大学与清华大学(1937—1946)》记录,当时昆明物价为抗战初期的404倍,而联大教职员薪金只有原薪金的10.6倍。梅贻琦在日记中也曾描述过一家人为避空袭租住了西郊龙院村的李家院子:“屋中瓦顶未加承尘,数日来,灰沙、杂屑、干草、乱叶,每次风起,便由瓦缝千百细隙簌簌落下,桌椅床盆无

论拂拭若干次,一回首间,便又满布一层,汤里饭里随吃随落。每顿饭时,咽下灰土不知多少。”韩咏华留下了更为详尽具体的记述:

我们和潘光旦先生两家一起在办事处包饭,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没有青菜,有时吃菠菜豆腐汤,大家就很高了。教授们的月薪,在一九三八、三九年还能够维持三个星期的生活,到后来就只够半个月用的了。不足之处,只好由夫人们去想办法,有的绣围巾,有的做帽子,也有的做一些食品,拿出去卖。我年岁比别人大些,视力也不很好,只能帮助做做围巾穗子。以后庶务赵世昌先生介绍我做糕点去卖。赵是上海人,教我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由潘光旦太太在乡下磨好七成大米、三成糯米的米粉,加上白糖和好面,用一个银锭形的木模子做成糕,两三分钟蒸一块,取名“定胜糕”(即抗战一定胜利之意),由我挎着篮子,步行四十五分钟到“冠生园”寄卖。月涵还不同意我们在办事处操作,只好到住在外面的地质系教授袁复礼太太家去做。袁家有六个孩子,比我们的孩子小,有时糕卖不掉时,就给他们吃。有人建议我们把炉子支在“冠生园”门前现做现卖,我碍于月涵的面子,没肯这样做。卖糕时我穿着蓝布褂子,自称姓韩而不说姓梅。……由于路走得长,鞋袜又不合脚,有一次把脚磨破,感染了,小腿全肿起来。

以上即是流传最广的“梅校长夫人挎篮卖定胜糕”的来龙去脉。

我向表姨梅祖芬核实这段往事,她做了一些补充:“赵世昌先生是潘光旦夫人的弟弟,他教给我娘他们的配方:七成大米、三成糯米,加上白糖和好面。之后,用一个元宝状的木模子做成糕,放在炉子上蒸,两三分钟蒸一块,蒸出来的糕是粉红色的。在二表舅母家里制作,由我娘负责送到冠生园寄卖。有时我也跟着去送。”

话中提到的“二表舅母”即袁复礼先生的夫人。袁复礼是韩咏华的表弟,那时他们一家八口也住在西仓坡,和梅家在一条胡同,两家相距不远,他们的生活也很艰苦。西南联大一些教师靠兼课获取的额外收入来补贴家用,而袁复礼从来没有去兼过一节课,全部心思都放在学生身上。他家子女多,收入少,到了冬天孩子们都穿不上毛衣。学生们看不过去,大家凑钱买了几斤粗毛线送去,好几次都被袁先生拒绝了。最后不得不请一个研究生去再三说情,袁先生才勉强收下了。

袁复礼的夫人廖家珊也是大学毕业生,为了让丈夫把全部精力用在事业上,她放弃了工作,承担起全部的家务重担,六个孩子都是她一手带大的。韩咏华说:“袁家有六个孩子,比我们的孩子小,有时候糕卖不掉时,就给他们吃。”这段话讲的正是这一段时间两家互助共度艰难。在自己家中,韩咏华把卖糕得的钱给祖彬、祖彤每人六十元,那时两人已经上西南联大了,祖彬、祖彤还在读中学,所以给他们每人二十五元,最小的祖芬也会给五元,让他们添置学习用品。“后来,梅先生很觉不安,因为教授夫人们孩子多,家务忙,顾了做零工,就顾不上管家,这样不是长久之计。以后由清华工学院为驻华美军承担设计,建造房子,得了钱分给教职员贴补生活,大家的日子就过得好一点了。”

(《韩家往事》徐泓/著,商务印书馆2024年1月版)